

学术与政治之间

XueshuYuZhengzhiZhijian

徐复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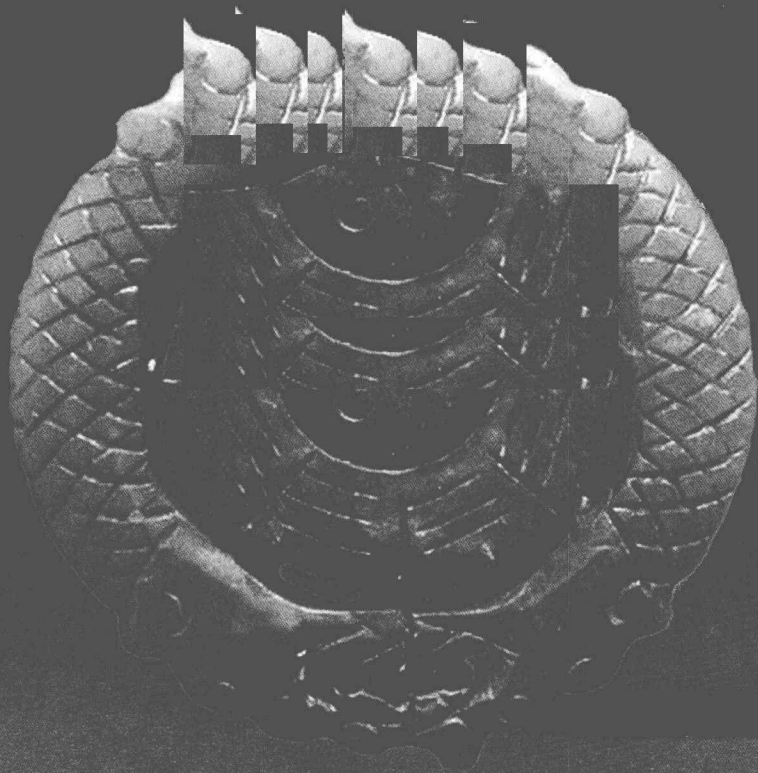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与政治之间

徐复观 著

XueshuYuZhengzhi Zhij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与政治之间/徐复观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徐复观文集)

ISBN 978-7-5617-6630-9

I. 学… II. 徐… III. 政论-台湾省-文集 IV. D675.8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774 号

学术与政治之间

著 者 徐复观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孙 浩
责任校对 林文君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門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6630-9/B·489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新版自序

经过二十多年，这部杂文又由学生书局在台湾重新排版印行，主要是来自冯爱群先生和我三十五六年的深厚友谊。假定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只在一个土生土长的茅屋书生，面对国家兴亡，世局变幻，所流露出的带有浓厚呆气憨气的诚恳待望。待望着我们的国家，能从两千多年的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民主法治的大道。待望着我们的文化，能不再受国人自暴自弃的糟蹋，刮垢磨光，以其真精神帮助世人度过目前所遭遇的空前危机。我所能做的实在太渺小了，渺小得毫不足道。但精卫绝无填海之力，却不妨它抱有填海之心。读者若能于文字的呆气憨气中有以谅其区区填海之心，便是我的大幸。

里面的文章，都是住在台中时写的，也是由台中的朋友汇印成书的。在我流浪的一生中，住台中的时间，比住生我的故乡还要久。台中的人物风土都给了我深厚的感情，自然也萦回着我永远的怀念。假使九原可作，则为我题封面的庄垂胜先生，看到由他所发心的这部书，能以面目一新的姿态重新回到台湾，他该是多么高兴。念及此，不觉为之泫然。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浣水徐复观序于九龙寓所

港版《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我由一九四九年开始正式执笔写文章。承亡友庄垂胜(遂性)先生的厚意,一九五六年,在与他有关系的中央书局为我汇印成《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一九五七年又汇印成乙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标题,也是他为我写的。甲乙集印行后,因我发表过《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一文,不知怎的,转一个弯,引起某一地域里的“名士”们的不满,竟把祸嫁到甲乙集上。有一次我到台北,当时某机关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先生请我吃饭,还约了我两位好朋友作陪。吃饭中,王先生再三要我把甲乙集自动收回,被我拒绝,弄得彼此间很不愉快。幸亏美而且贤的王夫人当场责备了王先生几句,大家借此收场。后来知道,王先生之所以出此,是由他机关里的一位“诗人”促使的。另有某位先生,以断章取义的方法报告给蒋公,使我离开了国民党的组织。但蒋公并没有因此对甲乙集做过任何禁止发行的指示,只是在此种情形下,听任它自行绝版。现在想来,这里面的文章,假定是现在执笔,应当减少当时由热心太过及不算刺激的刺激而来的许多尖锐词句,以致形成“心善面恶”的情形,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而甲乙集毕竟能卖完为止,王超凡先生也只是“先礼”却并没有“后兵”,这不能不感谢中国的政制及许多老朋友的爱护。某位先生虽在政治一路上飞黄腾达,而王先生则早已离开人世。偶然回想及此,徒增加生活史中的一点慨叹。

我的个性,在自己某部书印出后,认为此方面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即不愿再看第二次。对有点不祥之感的甲乙集,更是如此。去岁冯君耀明却花费宝贵时间把它重新校阅一过,并提出若干宝贵意见。现时他又约同友人要把甲

乙集合并为一集，发行香港版，我没有反对的理由。其中只去掉四篇文章，增加一篇文章；不妥的字句则一仍其旧，以保持原来面目。这里面的文章，就我个人来说，只能算是对国家问题、对学术问题摸索、思考的一个历程。十年以来，我还是继续摸索、思考，希望能向前走一步两步。对读者来说，若能从这些文章中接触到大时代所浮出的若干片断面影，及听到身心都充满了乡土气的一个中国人在忧患中所发出的沉重的呼声，我便感到满足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徐复观志于九龙寓庐



自序

继《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甲集后，又选印出这部乙集，完全是由于中央书局的朋友们的好意。在乙集里，学术性的讨论超过了政治性的讨论，这只能说明我个人生活的环境与心情正在天天演变。倘由此而能演变到将我的余年完全埋葬在书房里面，那将是人类对我所作的最大恩赐。我希望能得到这种恩赐。

在乙集里面也收有若干在情调上与全书并不十分谐和的文章，这纯是留作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纪念，希望读者与以原谅。

对于无涯的知识，每个人都是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对于无穷的人生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当下自足，但同时也会感到仰之弥高。自己所没有研究到的知识，应谦虚地予以保留；自己所没有达到的人生境界，应虔诚地加以尊敬。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学人所必须具备的良心，也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自由的基础。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便要独断地加以打倒；自己所未达到的人生境界，便要武断地加以踏平；每个人觉得自己就是知识世界的全体，自己就是人格世界的全体。像这种精神中的各个极权王国，若不设法把它敞开，则人类的文化、个人的生命都将感受到窒息，而失掉谈文化、讲思想的真正意义。

许多精神的极权王国之所以形成，我怀疑它和今日的政治问题有种共同的心理因素，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过分的自卑感。在现实政治中本找不出圣贤，便不能希望搞现实政治的人能放弃个人的权力欲望。但有的人，在民主政治体制之下，一样可以得到光荣的权力；可是他们宁愿面对社会、面对世界，说出许多自损尊严的虚辞诳语，以求达到欲盖弥彰的反民主自由的目的。在他们的各种说法中，绝找不出可以作为反民主自由的任何根据。然则原因到底何在？恐怕只是由于在每个人念虑的几微之际，有一种“满身污秽”的自卑感觉，因而只想躲在薄暗的殿堂里面，不愿照见民主自由的太阳。此种自卑心理的未能解除，结果造成了国家和政治中各个人自身的不幸，是非常显而易易

见的。

在今日，既有人以满身污秽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政治问题，也有人以“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来面对文化问题。在此种人的心目中，觉得只有咒骂侮辱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减轻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罪孽感。政治上反自由民主者口头上的理由，是说中国不合于自由民主，亦即是承担不起自由民主；把个人承担不起的自卑心理，投射在整个的国家身上。文化上反历史文化者的口头理由，是说不打倒自己的历史文化，西方的文化便走不进来；把这一代人的阴鄙堕退，一笔写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身上。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一任自己理性良心的评判、选择、吸收、消化。满面羞惭的自卑心理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抬不起头来，这固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在此种情形下，纵然有少数人能认真做一部分西方文化的研究工作，但其内心深处好像旧社会里不敢抬头的男女恋爱，很不易为国家得到结婚生子的结果。何况抱着此种心理的人，多半是东张西望地混过一生，最后还是对文化交白卷。

因此，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一个人，一旦能自觉到其本身所固有的尊严，则对于其同胞、对于其先民、对于由其先民所积累下来的文化，当然也会感到同是一种尊严的存在。站在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地平线上，中西文化才可以彼此互相正视、互相了解。在互相正视、互相了解中吸收西方文化，这有如一个像样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工商业者做经济来往一般，倒真能做点有规模有计划的以有易无的两利生意。我不认为在买办式的精神状态下，甚至是在乞丐式的精神状态下，能有效地吸收世界文化以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时，西方人要靠这种买办式的东方人来了解东方文化，也同样是非常可悲的事。

年来在学术上我和时贤所发生的争论，绝非出于个人僭妄之心，想用我的学问去压倒时贤的学问；我很坦白地承认自己并没有学问。只是从时贤谈学问的态度中引发我上述的感触，因而不能抑制自己，写出了这种感触。把政治上的感触写出来容易，但把文化上的感触写出来却相当困难，因为这要冒着社会风气的大不韪。现实政治上的压力，在形式上很重，而在精神上却很轻。社会风气的压力，在形式上似乎很轻，而在精神上却很重。一个人的生命，若非

不幸而完全沉浸在这种时代感触之中无法自拔，谁又肯冒双重的压力，以自甘孤立于寂天寞地之中，而可不惧、不悔、不闷？假定我所感触的毕竟无法与此一时代的心灵相感相通，则我恳切地希望我的感触只不过是个人无病呻吟的谬见，以让我们的时代能背弃我的感触而向前迈进。至于我在讨论中常常不免对人用上过当的辞气，这完全暴露我做人的修养还无法克制在执笔时的心情。我把这种辞气照原地保留下来，借此表示我内心愧疚。

当我忙于授课的时候，省立农学院的高希均同学肯自动为我细心校正印稿，因此使我节省不少的时间精力，这和中央书局愿出力印行此集的朋友，是同样值得感念的。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日徐复观志于东海大学宿舍



再 版 序

兹当甲集再版之际，仅述两事以资感念。第一是在周弃子先生阅过的一册文录上，注出的错字有五十七个之多，我便借回来一一改正，得以偷懒省去自己的再校工作。此外，我还发现他在八个地方记下了问号。对于这些问号，虽然除了二十一页第十行提到五四运动的几句话，实在近于粗率，深感不安外，其余的我不愿另外表示意见，但周先生肯这样认真地细阅这本文录，实使我感到荣幸。其次，文录出刊后，程沧波先生曾写了一篇介绍文章，称誉过当，某机关报的星期专论曾指射这是文人的互相标榜。但我知道沧波平生是不轻作谀词的人。他之所以称誉过当，恐怕完全是出自他对时代的感。读者若从沧波文章的正面来衡量我个人，我便会觉得非常惶恐。但若从他文章的反面去正视此一时代，了解此一时代，则将立刻发现由他那一副苍凉感情所浮出的文字，也实有其客观的意义。他在文章收尾处更补上顾亭林初看见《明夷待访录》的一段史实，他说他自己不敢自拟于亭林，而以黄梨洲期待我，这或许更增加标榜之嫌。但我觉得，顾亭林、黄梨洲这两个姓名，现在的人看起来很以为光荣，但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恐怕是不祥之物。我国历史中，政治势力才是最动人的东西。担当一个与现实政治势力经常处于危疑状态的人类责任，独往独来，这并不是讨便宜的勾当。因此，时代假定依然需要顾亭林、黄梨洲，这将是与人无竞、与世无争的一条人生道路，而沧波正不必以此谦让未遑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徐复观于私立东海大学

自序

三年以来，中央书局的朋友常要把我已经发表过的零篇文字汇印一部分，最近我始以感激的心情加以接受。此一规模并不鸿巨的书局，过去在日人统治之下，曾经从文化方面表示了人类的尊严、祖国的尊严。我的文字，只有有这种历史的书局，才愿自动伸出手来，才使我感到有汇印的意义。

我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并且我从来也不曾觉得在这样逼窄的空间，专靠卖文便可以维持生活。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写文章，只因身经巨变，不仅亲眼看到许多自以为是尊荣、伟大、骄傲、光辉的东西，一转眼间便都跌得云散烟消，有同鼠肝虫臂。并且还亲眼看到无数的纯朴无知的乡农村妇，无数的天真无邪的少女青年，有的根本不知今是何世，有的还未向这世界睁开眼睛，也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待罪的羔羊，被交付末日的审判。在这审判中，作为人类最低本能的哭泣、呼号，作为人类最大尊严的良心、理性，都成为罪恶与羞辱，不值分文。而我的亲友、家园、山河、大地，也都在一夜之间永成隔世。凡这种种，并非历史中的神话，而是一个人亲身的经历，则作为“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的我，对此一巨变的前因后果，及此一巨变之前途归结，如何能不认真地去想，如何能不认真地去看。想了看了以后，在感叹激荡的情怀中，如何能不把想到看到的千分之一，倾诉于在同一遭际下的人们之前。所以我正式拿起笔来写文章，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因此，不仅我的学力限制了我写纯学术性的文章，而我的心境也不容许我孤踪独往，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章。我之所以用一篇《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文字来作这一文录的名称，正是如实地说明我没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与此一时代不相关涉的高文典册。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至于我在这泛滥着百千万人的血河泪海中，大之不能逞呼风唤雨之灵，小之不能陈鸡鸣狗盗之力。几希之明，只能倾吐出这些微末不足道的慨叹，以偃蹇于荒天漠地之中，内心的惶愧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在这里,除了已经印成单行本的不再收录外,有关纯时事性的文字也几乎不曾收录。此会使许多读者失望,但这绝非因此类文字已境过情迁,一无价值。相反的,此次重清旧稿,发现我过去写这类的文字时,常是倾注自己的心血,以直接承担着时代中的某一问题;我从未觉得我是与恶魔决斗的勇士,而只是在我的前后左右,没有安放恶魔的位置。所以每篇文字中,尽管夹杂有许多的委曲,但总流露有几句真切的话,以与时代的呼吸相通。我之所以不收录这类文字,第一,是因为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特别艰难,不容多一次浪费纸墨。第二,是因为这类文字虽不是什么肘后之方,但总希望对时代的智慧能稍有所补益。此而不能,则惟有留待将来的历史家,当他们开辟榛芜时作一点索引之用,所以现在宁可束之高阁。同时,我也常常想到,一个病人正当生死存亡待决的关头,也正是医生们的诊断工作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候。等到病人的前途只靠自己的生理作用而不是靠药物刀圭,则医生们自然可以悠闲下来,把注意力转向另外的事物。因此,我不仅近三年来极少写这类的文章,恐怕今后对此会完全搁笔不写了。但我得再郑重声明一句,中国古圣先贤,有如孔子孟子,他们对当时君臣们的谆谆告诫,实际就是他们的时论文章。所以我认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这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证明,要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则政治指导之权必操于社会。社会指导政治的具体途径,一为舆论,一为选举。有真正的舆论乃有真正的选举,故舆论又为选举的先决条件。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正说明此一时代的终结。因此,我坚信希特勒之流必永远受到人类的唾骂,这是他得到的阿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收在这里的二十篇文章,其次序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在内容上,有的地方感到重复,因为这本不是一部组织完整的书;有的地方又感到互有出入,因为这是个人在不断的思索过程中自然发生的演变。本来是极寻常的道理,但要真能心领神会,直接加以承担,却须几经曲折,几经甘苦,得来却并不容易。我对中国的政治问题,一直到写《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一文时,才算摆脱了数十年来许多似是而非的纠缠,看出一条明确简捷的道路。我对于中国文化在解决中国今后问题中所占的地位的问题,一直到最近三年,才能从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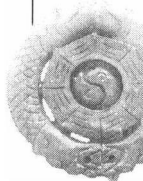
史和时代的泥淖中拔了出来，得出一个确然不可移易的分际和信心。我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包括在这本文录里面，甚至有许多还没有写出来。但这本文录也多少可以表示我在思考途程中的标志。

我深深地体验到，在这样的时代，要保持一个干净的心灵，不仅须靠个人不断地反省、忏悔，并且也还需要外缘的帮助扶持。所以我对于年来在精神上、生活上给我以许多鼓励和关注的朋友，愿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二日徐复观志于台北旅次



<h1>目 录</h1>	
新版自序·····	1
港版《学术与政治之间》自序·····	2
自序·····	4
再版序·····	7
自序·····	8
论政治的主流(存目)·····	
文化精神与军事精神·····	1
我们信赖民主主义(存目)·····	
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存目)·····	
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	7
与程天放先生谈道德教育·····	17
谁赋《豳风·七月》篇·····	23
怀古与开来·····	30
文化的中与西·····	34
政治与人生·····	38
中国的治道·····	42
附录:治乱的关键(殷海光)(存目)·····	
理与势——自由中国的信念(存目)·····	
论组织(存目)·····	
学术与政治之间·····	60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	68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83
东方的忧郁(存目)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97
附录:评《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程沧波)(存目)	
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存目)	
从平剧与歌舞伎座看中日两国民族性	108
从现实中守住人类平等自由的理想	111
为生民立命	115
向日本人士的诤言	117
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	121
释《论语》“民无信不立”	125
释《论语》的“仁”	131
政治上的识与量	146
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	149
《中庸》的地位问题	191
斯大林对人类的伟大启示(存目)	
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问题	205
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	214
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存目)	
两篇难懂的文章	225
悲愤的抗议(存目)	
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	240
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与义理》	244
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存目)	
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	258



文化精神与军事精神 ——湘军新论

洪杨起兵金田，是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这在历史上当然有他重大的意义。但民族有其躯壳，也有其灵魂。躯壳是血统服朔，灵魂是历史文化。孔子作《春秋》，严华夷之辨，但孔子所谓华夷，不仅是种族问题，主要的还是文化问题。所以诸夏在文化上(礼)而自退于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在文化上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发展为这样大的一个集团，并不单纯是种族的蕃衍，而主要的是文化的凝铸。洪杨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号召是正确而动人的，但他的文化背景则是半生不熟的天主教。而这种半生不熟的天主教，是和他的武力政权结合在一起的。这便是肯定了民族的躯壳，而否定了民族的灵魂。既否定了民族的灵魂，便也掩盖了民族的躯壳。于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真正责任感的人，遂起而作“卫道”之战，也就是为历史文化而战。所以洪杨与湘军，都是拿着了民族的一面来作武器。从这一点说，洪杨既不是“发匪”，而曾国藩也不是什么“民族罪人”。曾国藩在他的讨贼檄文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是他起兵动机。檄文中又说：“不仅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这是说他作战的目的。又接着说：“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这是说他气类结合的标准。通过曾氏一生的立身行己来看，不能说他在檄文上所说的话不是出自他的真心。假定洪杨们不弄“天父天兄”的那一套，而军纪能稍稍好一点，则曾国藩们恐怕要



重新考虑其态度。所以湘军对洪杨之战，是文化之战。湘军的主要人物，系先对文化有真切之感，然后才能发动此一战争。此一战争的性质，既系对文化负责，则文化的精神自然会流注为军事的精神。而中国文化亦在此一方面得到一个测验。克劳塞维兹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提出了军事与政治的关联，为军事学上的一大贡献。湘军则直接证明了战争与文化的关联，证明了军事精神与文化精神之可以合体。这一点在军事史上应该占有不朽的地位，也值得我们特别提出。至于湘军后半段的将领，以及受湘军影响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广义的湘军与淮军等），则渐渐蜕变而结为“功名之士”。这固然较之童嬉顽鄙者高出多多，但那已不是湘军建立的原意。曾国藩不能不用这种人，但并不重视这种人。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说：“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虽才智有大小深浅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拿这个尺度看，则自曾国荃以下皆不足以代表湘军原始的真正精神。我们一定要把他区别来看。不过这种功名之士，在湘军那种原始精神提挈之下，自然比一般的功名之士要来得深厚。

二

湘军精神既然是中国文化精神所流注，则要了解湘军精神首先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我的学力不够阐发这样一个大题目，只能把初步的了解简单地说出来。孔子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说中国的文化是对人的忧患负责而形成发展的，所以是人本主义的文化。这可以从两点来说明。第一点是对自己人格的负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而要克去人心（一般生理之心、动物之心），发扬道心（即是所谓“克己复礼”），以完成人格的尊严，使个人的起心动念都从人心的小我中净化出来，以“上不愧于屋漏”。于是戒惧敬畏之念自然随对自己人格责任之感以俱来。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居处恭，执事敬”，都是文化精神在这一方面的表现。第二点是对人类负责。所谓“道心”，是从“恻隐之心”去把握，在“仁”上面去完成的。推恻隐之心，便可知“大人者，连天地万物为一体”。因而个人人格的完成，不仅是对个人负责，同时即须对人类负责。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必归于“天下归仁”，“匹夫匹妇，有不得